

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庄梅茜/文

[摘要] 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新阶段,还在生产效率提升的背后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变革。资本逻辑驱动下的技术变革一方面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剥削程度,并推动了全球化生产网络的扩张,导致资源分配格局的失衡。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新异化—新积累”分析框架,通过揭示技术如何被资本所俘获来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对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模式的深层影响。文章指出,数字资本主义以技术进步为名,掩盖了其通过剥削和异化来维持资本积累的本质;其依赖技术的新型剥削模式只会深化社会矛盾,导致更严重的系统性危机。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 全球化 金融化 异化 资本积累

当前,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模式深刻变革的动力引擎,也成为重塑劳动关系的阶级矛盾的关键变量,展现出资本主义强大的适应性和韧性。数字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效率和生产力提升层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还通过全球化生产网络的扩展强化了资本的剥削模式,催生出新的社会不平等和劳动异化现象。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革新并非简单地推动生产力的提升,而是通过数据垄断、平台治理和劳动控制等方式深刻地重构了资本与劳

动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和阶级矛盾。

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模式的变迁入手,揭示数字资本主义在技术变革背景下的运作逻辑及其对劳动异化和阶级矛盾的影响。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实证分析相结合,本文提出“新异化—新积累”分析框架,用以解释这一变革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影响,以期理解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新矛盾和新动态提供新的启发。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数据驱动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模式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技术和数据的交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塑造当代社会经济体系。资本积累逐渐从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转向以信息、数据和消费者行为为核心的虚拟空间。这一转变不仅提升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效率和扩张能力,还推动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的深刻变革。如何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其核心特征、运作逻辑和内在矛盾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全面把握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至关重要。

不同于传统的物质产品生产,数字资本主义是通过控制数据和消费者行为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这一转变影响了生产方式、工作的本质以及经济稳定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审视当前经济状况的重要视角。从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出发,数字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数字网络的私人所有权为特征的财产制度。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所指出的:“有一句各方都认同的政治格言构成了这种合作的基础:企业资本对网络的所有与控制毋庸争辩,甚至毋庸商榷。”^①尽管以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为名,但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将人类带向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一言以蔽之,“数字技术调节着资本主义的结构”^②。

第一,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兴起从根本上颠覆了生产过程和资本积累模式。这一阶段的特征在于,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对传统工业和劳动市场的更迭创造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效率和规模扩张能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的发展会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关系则反过来适应生产力的变化,进而导致生产方式的重组,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社

会关系的重新定位。一方面,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使平台资本家可以有效地控制数据和算法,进而控制市场和经济。他们的市场垄断地位促成了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即所谓的“数字租金”。简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以数据、知识和信息作为生产要素的生产劳动能够带来巨额利润,这些利润通过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保护等私有化手段转化为资本,并最终被完全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③另一方面,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减少了传统生产过程对人类劳动的直接需要,导致了劳动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对低技术劳动力的排斥。这造成了工作内容的改变和劳动力角色的边缘化,加剧了劳动异化现象。

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在《平台资本主义》一书中分析了技术如何构建了一个以平台运营商为中心的新经济模型。^④这些运营商控制关键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流,利用平台的垄断地位操纵算法来优化交易、影响消费者行为,并以此获利。在这一模式中,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已经逐步被用户生成的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服务所替换。萨比尔·拉曼(Sabir Rahman)和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特别强调了支持和维护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联盟和制度条件。他们认为,美国的制度条件提供了一个特别适合新企业模型蓬勃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平台资本家不但能够利用美国的碎片化政策格局快速扩展网络以实现规模化,还能够利用美国法律制度体系,这一体系促进和支持构建在平台经济基础上

^① 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② 乔纳森·佩斯:《什么是数字资本主义?》,陈滕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4期。

^③ 靳欢欢:《技术封建主义使资本主义更糟糕——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逻辑及其生产力考察》,载《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5期。

^④ 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7.

的消费者—投资者联盟。此外,高度金融化的美国政治经济能够提供平台公司所需要的大量“耐心资本”以实现规模化增长。^①讽刺的是,这些平台企业并不直接参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而是通过控制平台、数据流和消费者行为来攫取剩余价值。这一新型的剥削方式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和寄生性特征。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成为了全球资本的核心资产,而数据的积累和流通则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二,数字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主要体现为经济社会事务的高度数字化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侵犯。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将这一新的资本主义形态称为监控资本主义。^②监控资本主义源自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由谷歌和脸书等大型科技公司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来实现广告精准投放的商业模式。这些公司通过不断追踪和记录用户的在线活动为用户“画像”,并利用这些数据来开展个性化广告投放等商业行为。监控资本主义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伦理问题,包括个人数据滥用、信息泄露、社会操纵等。在数字时代,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几乎无处不在,用户行为、偏好甚至情感状态都被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被用于商业目的,还可能被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用于监控和控制,削弱了公民的自主权和对政府的信任。^③近年来,多起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数据安全的担忧。这类事件暴露了数字平台在数据保护方面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监控资本主义的质疑。此外,监控资本主义还带来了操纵大众的风险。科技公司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和算法推荐对用户的行为和决策进行微妙的操控,形成“信息茧房”,从而导致社会的分化和极端化。这类隐秘的操纵手法不仅可能影响个人的政治观念和行为,还有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第三,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技术不仅重新定义了劳动力需求的性质,还改变了工作内容、工作场所布局以及雇佣形式的结构。虽然数字化和自动化导致的某些工种的消失并不一定会导致工人整体就业机会的减少,但是这一趋势会带来就业结构的深刻转变,迫使劳动力从受影响的部门转移到新兴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行业。在就业市场上,编程、机器维护、系统分析等专业人才的需求将持续上升,与此相应的则是传统的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工作岗位的急剧减少。这一现象通常被称为“技能偏置技术变革”:高技能工人能够从新技术中获益,而那些无法跟上技术变化步伐的低技能工人则面临着失业的风险。更为可悲的是,虽然高技能劳动者暂时享有一定的就业优势,但他们同样面临着技能过时的风险。因此,持续的学习和技能更新成为高技能劳动者维持竞争力的关键,这给所有从业者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④此外,自动化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也给现有的劳工组织和集体行动带来了挑战。随着工作性质、工作地点和劳动合同的变化,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变得更加困难。这不仅弱化了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还削弱了他们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

以上变化表明,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在改善生产效能的同时,加剧了技能和收入的差

① Sabeel Rahman and Kathleen Thelen,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Vol. 47, No. 2, 2019, pp. 177-204.

② Shoshan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9, p. 14.

③ David Karpa and Michael Rochlitz, “Authoritarian Surveillance and Public Support for Digital Governance Solu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https://doi.org/10.1177/00104140241290208>.

④ Daron Acemoglu and David Autor. “Skills, Tasks and Technologies: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4, 2011, pp. 1043-1171.

异,既导致了劳动力的分层和工人内部的分裂,又扩大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的新生产方式和劳动市场的变化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①

在数字化和金融化的资本积累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引发了人们对劳动、生产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剥削维度的重新思考,其重要体现便是灵活生产方式的出现和资本积累逻辑的改变。

二、灵活生产和新形式的劳动异化： 后福特主义的关键转折

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以灵活性、分散化和网络化为特点的新阶段。^②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便是灵活的生产方式,其出现预示着后福特主义发生了关键性转折。后福特主义强调生产的灵活性、多样性以及对新信息技术的依赖。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在《第二次产业革命:走向繁荣之可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后福特主义和柔性专业化的概念,认为其代表了从规模化的标准化生产向更为灵活的、定制化的生产方式的转变。^③对后福特主义及其引起的劳动过程变化的分析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持续占据着核心地位。后福特主义理论认为,信息技术的兴起使得生产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实时调整,这种“柔性积累”方法允许生产更加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降低库存,同时优化生产地点和生产时间。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组以及工作形式和劳动关系的转变,这为资本提供了在全球范围内

“调度”劳动力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劳动者的工作安全和权益带来了挑战。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资本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零散的和临时的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全球范围内重构劳动力市场。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给劳动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异化效应,尤其在零工经济和“数字游牧主义”模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零工经济强调劳动者可以灵活地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类型,但这一灵活性往往是以剥夺长期工作保障、退休金和健康保险等福利待遇为代价的。^④作为零工经济的具体体现,数字游牧主义依赖数字技术、互联网和移动设备,使劳动者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工作。许多数字游牧者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通过平台接单,从而使得这种模式经常需要依赖数字平台的中介作用。^⑤正如乔纳森·佩斯(Jonathan Pace)所指出的:“数字化机器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进行操作,这使得与后福特主义相关的跨国生产链成为可能。”^⑥这一工作方式表面上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性,然而劳动者工作的不稳定性和对资本的依赖性却变得更加隐秘和碎片化。同时,工作的灵活性往往意味着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致个人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被侵蚀。

近年来,批判零工经济和数字游牧主义的研究成果在西方学术界大量涌现。其中,盖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② 乔纳森·佩斯:《什么是数字资本主义?》,陈滕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4期。

③ Michae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④ 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2017.

⑤ Inge Hermann and Cody Morris Paris, “Digital Nomadism: The Nexus of Remote Working and Travel Mobil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Vol. 22, No. 3, 2020, pp. 329 – 334.

⑥ 乔纳森·佩斯:《什么是数字资本主义?》,陈滕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4期。

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在其影响颇广的政治人类学著作《朝不保夕的人:新的危险阶级》中指出,在全球资本主义中,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迫承担临时性的零工作业,无法获得长期的工作保障和社会福利。^① 在没有长期承诺的灵活工作模式下,劳动者面临着更大的经济不稳定风险和更弱的集体谈判力,这些都是后福特主义趋势下工作变革的副作用。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国》一书中探讨了后福特主义经济中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影响。^② 他们指出,灵活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分散化和非正规化的工作模式。然而,这种生产方式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并未减少,反而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更加细致和全面。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数字游牧主义和零工经济的崛起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新形式的体现。在这一模式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变得更加隐秘和碎片化。数字化转型实际上为资本的全球性控制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机制。劳动者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新型的不平等和剥削,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贡献并未得到公平回报。此外,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在全球化生产网络的重构中,资本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跨国流动,劳动者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逐渐模糊,劳动价值也被全球市场的波动所左右。在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愈加呈现出一种“超经济”的剥削模式,全球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三、全球化和金融化:现代帝国主义 资本积累的新模式

全球化和金融化不仅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展的表现形式,更是资本积累模式发生根本性

转变的标志。在传统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剥削来实现。然而,随着全球化和金融化的发展,资本积累模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它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生产活动,而是逐渐依靠金融市场的投机和虚拟经济中的资本增殖。这一转变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虚拟化”,即资本增殖逐渐脱离了传统的生产领域,更多是通过金融资产、投机行为和全球资本流动来实现。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控制全球金融市场和数据流动而非单纯依靠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剥削来巩固其霸权地位。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平台,还成为现代帝国主义扩张的新动力。通过数据垄断、信息控制和数字技术的全球渗透,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和剥削,进一步巩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地位。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资本金融化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曾指出,“物品的生产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也是为了交换”^③,而资本“不仅是自我保持的价值,而且同时是自我增加的价值”。^④ 关于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列宁明确指出:“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⑤ 这一观点揭示了金融资本在全球经济和权力格

①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pp. 11–20.

②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01–115.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6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⑤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395页。

局中的核心地位。而在数字化时代,这种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其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跨国公司和资源掠夺的模式,进入了以金融化为特征的时代。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资本不仅通过生产链的控制,更通过对全球数据流动和信息控制的操控,深入渗透到全球经济的各个领域。例如,大型科技公司通过收集和分析全球用户数据来优化其商业模式,实时调整市场供需关系,甚至影响他国的政治决策和经济结构。发达国家通过对数据和信息的掌控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并加深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殖民。

从帝国主义演变的历史脉络来看,全球化和金融化正是资本主义对全球权力关系进行重构的具体体现。其背后隐藏着资本的垄断和全球霸权扩张的深层逻辑,使现代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而言,全球化和金融化对资本积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资本扩张趋势来看,全球化呈现出资本高度集中和垄断的特征。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通过控制全球数据流动、算法的主导权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隐性地操控全球市场。这种新的资本控制方式不仅突破了传统市场和生产的局限,还通过信息和数据的垄断使资本积累变得更加高效和隐蔽,从而扩大了贫富差距。其次,在表现形式上,全球化与金融化紧密交织,形成了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虚拟经济”的主导模式。跨国金融机构通过货币投机、资本输出和金融工具创新攫取超额利润,其本质具有强烈的寄生性和剥削性。数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虚拟经济的扩张。加密货币、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资产的兴起使得资本得以绕过传统的金融监管,进行更加自由的全球流动和投机。这种虚拟经济的扩张不仅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还使得资本积累方式更加复杂和隐蔽。再次,在运

行机制上,全球化强化了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剥削关系。通过金融资本的控制权和技术壁垒,中心国家不仅在经济层面攫取边缘国家的劳动价值,还在制度和层面建立了新的帝国主义秩序。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使得这种剥削关系更加隐蔽和高效。例如,发达国家为维持其自身的技术优势和经济霸权,通过技术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限制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同时,社交媒体平台和搜索引擎成为传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工具,进一步强化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控制。

可见,全球化和金融化并非经济全球融合的体现,而是现代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使得现代帝国主义不仅通过军事和经济手段进行扩张,还通过信息战和软实力进行文化渗透,不仅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和阶级矛盾。

就资本主义的一般性生产关系而言,资本积累本质上是通过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的。然而,在金融化的过程中,这种剩余价值的来源被转移到了基于资产价格波动的金融投机之上,这本质上是一种对实体经济的剥削。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stas)在《获利却不产出:金融如何剥削了所有人》一书中指出,金融化代表了生产过程与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的疏解。^①资本在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往往与实体经济的增长相脱节,而是追求金融资产价值的增长。本·法恩(Ben Fine)和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Alfredo Saad-Filho)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中指出,金融化倾向导致资金从实体经济部门转移至金融部门。高度的金融化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导致新的系统性风险和金融系统

^① Costas Lapavistas, *Profiting without Producing: How Finance Exploits Us All*, London: Verso Books, 2013.

的重大功能失调,而这种失调最终会波及整个经济和社会生产领域,例如房屋贷款、养老金、福利政策、消费信贷以及公共服务的私有化等。^①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即体现了这种多领域、多部门的危机。这次危机并非由传统的股市狂热或商品崩溃而引发,而是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蔓延开来。金融化深入地渗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方面面,从而引发或加剧了资本积累、经济稳定性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的问题。

金融化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生决策更多地是根据金融回报而非生产率和工人福祉来制定。金融化不仅改变了资本积累的逻辑(通过银行贷款、股市融资等方式繁衍资本),还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偏好,导致亲金融市场的政策和法规倾向的实施。这些策略往往不利于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供,增加了劳动者的脆弱性。阿尔·坎贝尔(Al Campbell)和埃尔多安·巴克尔(Erdogan Bakir)在关于金融化和债务的文章中指出,金融资本通过债务扩张等方式促进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剩余价值的攫取,从而为整个资本主义服务。与之前的资本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危害更大。^②

由金融化带来的资本积累逻辑的转变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不平等的加剧。近10年来,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平等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在《资本主义:竞争、冲突与危机》一书中批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强调了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如何导致不平等的扩大和经济的周期性起伏。^③ 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在《理解社会主义》一书中更为全面地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劳动者利益的系统性侵蚀。他认为,政治革命可能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政权更迭,还指广义上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根本变化,包括经济制度改革。这样

的改革可能包括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建立更加民主的企业管理结构,以及在宏观层面上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④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资本主义所展现出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新趋势是由多个因素推动的,包括经济全球化、技术变革、税收政策变化以及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等。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⑤ 该书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不平等的历史根源和形式,以及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系统中持续存在并加剧。皮凯蒂认为,不平等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决策和经济制度的产物。他强调,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和法规来纠正市场力量,不平等将会加剧,并最终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以上分析表明,在资本金融化时代的生产关系框架中,资本和劳动恰似一个跷跷板的两头:资本愈是富有,普罗大众愈是贫穷。可以说,只要人类仍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被极少数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便无法消除。因此,金融帝国主义依旧存在于西方经济社会的现实之中。^⑥ 总体来看,全球化和金融化代表着资本积累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① Ben Fine and Alfredo Saad - Filho, *Marx's 'Capital'*, London: Pluto Press, 2016.

② Al Campbell and Erdogan Bakir, "Financialization and Debt: Much Worse than Parasit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54, No. 4, 2022, pp. 452 - 460.

③ Anwar Shaikh, *Capitalism: Competition, Conflict, Cri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④ Richard Wolff, *Understanding Socialism*, New York: Democracy at Work, 2019.

⑤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⑥ 李慎明:《科学判定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方位》,载《红旗文稿》2019年第1期。

这一转变使得资本主义从依赖传统生产方式的剥削转向依赖金融投机和虚拟经济中的资本增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和社会阶级矛盾。

四、“新异化—新积累”分析框架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层矛盾,也对社会公平和正义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依然具有重要的解释力和批判力,启示我们在应对新的经济现象时需要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探索有效的社会经济改革路径。

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理论来构建一个“新异化—新积累”分析框架,以分析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层矛盾。这一框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引发的矛盾,揭示技术变革如何塑造新的劳动关系和资本积累模式,从而加深了资本主义矛盾。所谓“新异化”,指的是数字化时代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劳动过程甚至社会关系的疏离加剧。在零工经济和灵活就业形式大力发展的背景下,劳动者在物质和心理上都经历了更加深刻的异化。在数字化时代,零工经济、远程和灵活工作方式往往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感,导致劳动者在心理和经济上更加异化。“新积累”则突出表现为资本通过技术和全球网络控制数据和信息,以加强其在全球生产和分配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数字化经济使资本能够跨越国界,迅速调整其在全球的运营和资源配置。这种对信息和市场的控制使资本集中加剧,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能力增强,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全球资本积累机制。这两个现象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本质矛盾的现代表现形式,即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以新的形式展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得到了新的激化和深化。

(一)新异化

数字化经济与全球化的结合不仅重塑了劳动关系,也使得阶级矛盾和剥削关系呈现出新的复杂性。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和剥削关系并未消失,而是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这些变化反映了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的观点。“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①在数字化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劳动关系和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深化了阶级矛盾和剥削关系的复杂性。

第一,随着生产过程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劳动者与其生产的产品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在数字化生产中,劳动者往往处于一个分段的、去个性化的生产流程中,他们对最终产品的了解和掌控越来越少,从而感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与自身的脱离。第二,劳动过程和劳动者的异化也随技术进步而加剧。自动化和算法决策的应用削弱了劳动者对工作过程的控制,劳动者变得更像是机器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有创造性的个体。早在1920年代,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在《历史和阶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意识到数字化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使劳动日益破碎化,从而对工人的身心造成伤害。^①这一理论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尤其是随着零工经济的兴起,劳动者权益受到压迫和分配不平等的现象日益增多。同时,技术进步和教育不平等加深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分配差异。这些新型劳动异化现象使得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具现代意义。这些现象表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被进一步压制,贫富差距加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社会关系以及自我认同之间的疏离感愈加明显。

(二) 新积累

数字化经济中的“新积累”现象表现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加速和集中。资本集中不仅表现在传统的生产资料和财富集中上,更是体现在信息和数据的控制上。资本通过控制信息流和数据流加强了对全球产业链的控制和利润的再分配,从而使得资本积累更加集中和高效。在这一过程中,大型跨国公司和科技巨头通过收集和分析大规模数据而预测市场趋势、优化供应链、增加个性化产品和服务来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这种数据驱动的资本积累使少数企业控制广泛的市场资源,形成了新的垄断力量。这不仅在经济上加剧了不平等,还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政治上,资本集中导致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平衡,使得国家政策和立法越来越倾向于满足这些大企业的需求,而非普通民众的利益。同时,资本对数据和信息的控制也加大了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的影响,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地位——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可以通过控制和影响脸书、推特来影响和操纵舆论。就阶级结构变化而言,资本集中加剧了阶层固化,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导致经济不平等更加根深蒂固。在这一背景

下,阶级矛盾呈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由权力和资源分配变化所导致的阶级对立关系的复杂化。这一特点的直接诱因是数字化经济和全球化共同导致了生产供应链跨越国家边界的重组,继而改变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互动方式。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也体现了全球范围内的阶级结构,其中发展中国家常常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经常依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这些现象深刻地反映了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因为资本集中和生产资料的掌控早已成为决定社会阶层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背景下,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对立并未消失,而是转变为更为复杂和多层面的关系。劳动者需要同时与本国的资本家和国际资本力量进行斗争,而他们的斗争场域已经从传统的工厂和本地市场扩展到全球虚拟空间和世界市场。这种转变导致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新的分化,其划分不再仅仅依据产业部门,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技能水平以及所面临的劳动条件。

二是资本集中的趋势不仅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还加剧了不同阶层、集团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冲突。在这一背景下,剥削还包括资本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对个人数据的利用等新形式。这些新形式的剥削通常隐于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之中,使得对其的批判和反抗更加复杂和困难。阶级矛盾的变化提醒我们:在为社会经济正义进行斗争的同时,必须考虑到现代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全球性,包括不稳定的雇佣模式、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市场分化以及全球生产网络对劳动力和资源的新分配机制。

总而言之,“新异化—新积累”分析框架有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助于我们分析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阶级矛盾是如何通过新的剥削形式和资本积累机制表现出来的。这一分析框架揭示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新的表现形式,并指出了尽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这对基本矛盾并没有消失,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依然具有重要价值。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上述情况正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内在矛盾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残羹剩饭就越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越多。”^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动力结构,比如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市场竞争,使得社会财富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愈加悬殊,而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背景下,这种不平等被放大了。

五、结语

从生产结构和动力要素上看,数字资本主义“不是某些发展的结构性原因,而是那些名义上的发展本身,因为它们是从数字化过程和资本主义结构的联结中产生的”^②。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深入探讨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及其影响。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些技术在提升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深化了劳动者的异化。与此同时,全球化生产网络的扩张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对市场的垄断,导致资本集中现象愈发严重。在分析和应对新经济现象时,我们需要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新异化—新积累”分析框架揭示了技术如何被资本所利用,并深刻影响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模式的深层机制。尽管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

了经济模式的转变,但其核心仍然是对劳动价值的剥削和对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换言之,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更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数字资本主义不仅依然处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以私有制和剥削劳动力为基础的大历史时代,也依旧属于列宁所说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历史时期。“新异化—新积累”分析框架为我们分析数字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视角。■

[庄梅茜:复旦大学政治学系]

(责任编辑 徐 焕)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4页。

② 乔纳森·佩斯:《什么是数字资本主义?》,陈滕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4期。